

暨南史學系
丛书

宋金时期 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

汤开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暨南史学丛书

宋金时期 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

汤开建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汤开建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2
(暨南史学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4300 - 7

I. 宋... II. 汤... III. ①吐蕃—民族历史—研究—安多地区—宋代②吐蕃—民族历史—研究—安多地区—金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8737 号

暨南史学丛书

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

汤开建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nj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上海灝輝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375 插页 4 字数 445,000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978 - 7 - 5325 - 4300 - 7

定价: 46.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总序

广东属禹域极南之地，自昔为海上交通枢纽。汉代合浦徐闻即为往印度洋航路出口障塞，《汉书·地理志》记之详矣。暨南大学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取《禹贡》“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为名，用意至深。故魁然为侨校之首。创校以来，一贯以发扬中国优秀传统、传播世界先进文化为职志，于推动历史研究，更不遗余力，早在1928年即有历史学系之创设。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执教之名历史家先后崛起岭表，何炳松之于史学理论，周予同之于经学史，丁山之于商周史，谭其骧之于历史地理，均树立风声，为暨大史学奠定扎实研究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家教学重点之扶持，史学队伍更为坚强活跃，陈序经、陈乐素、朱杰勤、金应熙辈，于宋史探索之深入，东南亚史、华侨史、港澳研究诸领域之开拓，蔚为重镇，于史学界中更别开生面。

近时暨大计划出版一系列“暨南史学丛书”，除刊布专著，并辑录近几年来暨大学人在国内外发表有代表性之论文，系中同仁来书要我写一序言。暨大在史学园地的成就，因地缘关系，特别朝向中外与港澳之关联及岭南人文活动等主题，作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自有它的特色与传统。至于新的课题，若“南海神庙之历史”及“阿刺伯人与南海舶”等专门研究，尚待推进，为岭南文化史填

补缺口,正是大家迫切期待的工作。港澳地区之历史学由于暨大史学研究成果之带动,彼此之间唇齿相依,更能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自不待言。因不辞弇陋,欣然而乐为之序。

饶宗颐

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序

这些年来,由于工作职务或学术兼职等方面的原因,应邀为他人著作做序撰言的事务难免。虽尽力推脱辞谢,但终因都是学界同仁,故或领情于前辈抬爱之意,或尊从于后学提携之需,还是写了不少。当然,为他人做序撰言也是一种学习,从中获取专业知识、感悟治学之道亦属难得的机会。

开建学兄邀我为他即将付梓的大作《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撰言,这的确让我为难。虽然我们是同辈学史之人,但若从史学修养和著述而言,唯能以“侪辈愧望尘”自惭。我与开建相识于庐山,那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次中国元史学会年会。是时,元史学会门下聚集了一批刚刚毕业和在读的硕士研究生,除日间会议交流外,晚上宿舍灯下的学术讨论热闹非凡,开建湖南口音稍重的普通话,挟中高音之势常常先声夺人。而言必有据的执着求证,显示了他扎实的史料功底。开建虽非专攻元史,但那次会后他却成为元史学界引人注目的新辈学人,而他治学特点却多有老辈学人的传统风格。我记得后来在南京的元史年会上,陈高华先生曾对他有关国学大师王先谦治史中的一些史料问题进行考据的文章评价颇高,尤其对他收集、稽考史料的功力多所称赞。后来,因自己专事现实民族问题的研究,加之开建从西北游走东南另辟

天地,失去了共同参加会议交流的机会。但是我们作为学友、朋友,依然交往甚笃。而且每每收获开建的大作,我都会为他取得的学术成就表示由衷赞叹。

开建嗜书,这是成就他学术修养的重要源泉。那次从庐山下来后我与他同行,并承蒙他在武汉书市对我多所指点。今年与他在京叙谈,闻之已专购房产辟为图书馆向学人、学生开放,存书4万余册,尤重于中西交通史、民族史和港澳台史等,足见他博览群书、涉猎之广。近年来,我曾数次应邀为开建的博士生审读论文或主持答辩,他在暨南大学已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其门下的博士生在澳门史、基督教传教史、澳门土生葡人和华人等研究方面已形成优势,相关的史料集成也相继出版,甚至在葡文、西文关涉中国的史料搜集方面亦成规模。只是每当拿到开建门下送审的博士论文,总感到“负担太重”,每部洋洋30万言,旁征博引、史料丰厚、观点鲜明、创建颇多。从中不难看出导师的治学之道、严谨学风和对学生倾注的心力,这些成就的确令人感佩。

开建进入民族史研究领域起步于安多吐蕃史研究。这部《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其中包括了他初涉这一专业方向的关注点,积十余年精力进行的倾心研究,内容关涉了安多吐蕃部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社会组织、人口分布等诸多方面,具有系统性。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在西北民族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安多吐蕃本身就是古代西南、西北诸族互动交融的历史结果。这部著作,在揭示古代甘青川藏走廊、河西走廊纵横交汇地区的民族变迁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我们认识中国古代“五方之民”密切互动的关系,展开了一个区域性的历史场景;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界正在升温的族际“走廊”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田野的研究范本。

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中,田野调查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话题,诸多学人身体力行予以实践。观察现实、描述现状固然是回答“是什么”必不可少的研究过程,但是要回答“为什么”则需要追溯于历史,把握事物的变迁过程。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说“不存在没有历史或不了解其历史就能加以理解的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文献就是民族史学家的田野,而开建在这方面的用心耕耘,可以说是民族史学界同辈人中的佼佼者。

郝时远

2006年9月8日于北京寓所

自序

对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的研究，始于我在兰州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当时我将硕士论文定为“北宋与西北各族的马贸易”，学术的关注点自然就落到了安多吐蕃的身上。有一件事非常有趣，不知什么原因，我对宋代青唐吐蕃首领唃厮啰的名字特别感兴趣，一见到就有亲切感。我经常将唃厮啰的名字放在嘴上念，并将“唃”字念成了 jiǎo，我的几位同窗立即纠正我，说字典上标明“唃”字应念 gǔ。我就同他们争，说唃厮啰清人译为嘉勒斯赉，嘉勒即唃之注音，故“唃”应读 jiǎo。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些往事一晃就过去了二十五六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对唃厮啰的研究，是我走进神圣学术殿堂的起点。

我经常讲，我涉猎的这一段藏学实际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藏学，而只能称之为西北民族史。因为这一段藏学基本上没有藏文文献的原始记录，在藏文文献中虽然有宗喀及宗喀王的星星点点的记载，但我们看不到这一宗喀王历史活动的清楚轨迹，且与当时的汉文文献无法比勘。研究宋金时期安多吐蕃史，主要依赖的是汉文文献。故此，搜集宋金时期安多吐蕃的汉文资料就成为我许多年来一直从事的工作。1980年，我和我的老师李蔚先生赴北京、上海、杭州查找相关的宋元文献，整整抄了厚厚的一大本目

录,准备在各图书馆翻阅。在北京,除了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当时总馆在府右街北海)、中科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及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外,我们主要在靠近雍和宫的北图国子监古籍部。我记得当时是冬天,北京的冬天冷得让人记忆深刻。一大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要顶着寒风,踏着积雪,赶到国子监,希望能早一点拿到书,也希望利用一天的时间多翻阅几本书。国子监的阅览室设在殿堂两厢的陈旧木板屋内,因为生炉子的缘故,里面灯光昏暗,烟雾缭乱,有时候还有很呛人的烟煤味。令人安慰的是,那时候图书馆的服务真是让人感动,你可以不停地调书;一次调书可达十几函(线装书)。因为是查找资料,我有时候一天上借书柜台调书十几次、上百函。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总是不厌其烦、也不知疲倦地满足我的需要。那时候查资料是真苦,要从数千种文献中将安多吐蕃的资料找出来,然后一条条手抄。我记得,当年宋元人大部分文集都在国子监里翻了一遍,还查看了不少明清人的集子和类书。每天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抄得手发麻,冻得腿僵直。当晚上九点迈出国子监大门时,几十页摘抄的资料已塞进了自己的书包,那一种喜悦早把辛劳与疲倦抛至霄外。然后赶到一家面馆吃上两碗热腾腾的炸酱面回旅社睡觉。紧接着又是第二天的查找与摘抄。如果说,今天的我在文献上还算有一点“功底”的话,北京的国子监应是我打下基础的第一练兵场。

安多吐蕃史料的积累第二个令我难忘的地方就是座落在兰州五泉山麓白银路旁的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里面陈设十分简陋,但西北文献收藏之富,可能居全国之冠。更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其中一老一少的两位图书管理员。老先生姓柴,我们叫他“老柴头”,他对馆藏西北文献之熟悉,有点像陈寅恪读两《唐书》,闭着眼睛就能找到要找的东西;小姑娘姓李,我们叫她“小李子”,虽患有眼

疾,好像并没有读过历史系本科,但对文献学一般知识的掌握,我相信,今天很多已经毕了业的历史学博士都会在她面前感到羞赧。这一老一少的热心服务,真使读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从1981年到1985年,我在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工作期间,大部分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省图的文献部中。民院离文献部仅咫尺之遥,从民院的半山转至山脚即到。在这里,我每天少则几函,多则十几函,甚至几十函地借阅,渴了就向“老柴头”讨杯茶喝,饿了就在旁边的牛肉面馆来一碗“二细”。那时候真年轻,一点都不知道疲倦,也从不犯困,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简直是家常便饭。就这样,日积月累,从正史到方志,从笔记到文集,从金石碑铭到考古资料,可以说,我把文献部收藏的与西北民族相关的文献资料基本上翻了一遍。我抄资料不喜欢做卡片,而是一本一本的分类或分书摘抄。如《长编》吐蕃史料,《宋会要》吐蕃史料,《长编》党项、西夏史料,《长编》回纥史料等(宋代文献中,我用力最勤的是李焘的《长编》,我对这部书至少翻阅十几次)。其他如仇池杨氏、退浑阿柴、沙陀小李、巩昌汪氏、穆宁生氏、宋元回回、草头鞑靼、黄头回纥及于阗黑韩等,都摘抄有专门的资料本。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很多课题我都想展开深入研究,但最终未能如愿。然而,正是由于对这一本一本原始资料进行竭泽而渔的搜索和长时间的积累,才使我对我国中世纪复杂的西北民族问题有了较为清晰的宏观把握,并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还能发掘出一批前人未曾使用过的史料。如李筌《太白阴经》的“关塞四夷篇”、戴表元《剡源文集》中的阎立本《西域图》、董迥《广川画跋》的唐《王会图》、穴砚斋本《宋武臣传》中的《种太尉传》、王安中《初寮集》中的“草头回纥”等。大批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使我的西北民族史及安多吐蕃史研究具有了许多与众不同之处。可以说追求创新应是我这一

领域研究中的亮点。

从 1983 年起,我开始比较系统地做两件事:一是仿王忠先生《新唐书吐蕃笺证》而做《宋史吐蕃传笺证》,这项工作先后做了 3 年,成果有 20 余万字,但总感觉不满意。主要原因是由于宋代安多吐蕃的藏文资料太少,无法用藏文资料比勘汉文记录,笺证的效果似未达到。故这部书稿一直存放在我的旧稿中,不敢面世。二是系统地编辑《宋代吐蕃史料集》,从 1979 年开始,苏晋仁先生就辑录《册府元龟》吐蕃史料出版。之后,各种文献的吐蕃史料辑录工作纷纷展开。鉴于宋代吐蕃史研究的薄弱,我准备从宋代文献中全面辑录吐蕃史料。1983 年,当时刚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的刘建丽要求协助我编辑吐蕃史料,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编完了《宋代吐蕃史料集》第一辑,50 余万字,1986 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紧接着,又于 1987 年出版了《宋代吐蕃史料集》第二辑,也是 50 余万字。原定计划出版三辑,一、二辑主要辑自宋代史部书中的安多吐蕃史料,第三辑则是辑自宋人笔记、文集、金石及方志中保存的零散安多吐蕃史料,加起来估计有六七十万字。第三辑的编辑工作也已完成,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付梓,留下了很大的遗憾。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民院的学生赵学东先生,当时也参加了吐蕃史料的辑录工作,他将《全唐文》及《全唐诗》的吐蕃史料全部辑出,但最终也是由于出版问题,至今手稿仍存于我的箱箧之中。

安多吐蕃,听起来就有点不伦不类,一个清代名词与宋代名词的组合。安多,唐宋时称“脱思麻”,或译“多思麻”,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即有此名。如果用“脱思麻吐蕃”,不仅读起来有点怪,而且,以“脱思麻”的地域概念远不能涵盖宋代吐蕃之分布区域。石泰安据西藏古地理著作称:“西藏的东部号称‘大蕃’,共分为三个地

区。这三个地区分别为：一、朵甘思（*mDo-Khama*），又称为下部地区（*sMad-khams*）；二、多思麻（*mDo-smad*），又称为野猫塘（*gyer-mo-thamg*）；三、宗喀（*tsong-Kha*），又称为吉塘（*Kyi-thang*）。^①元代的脱思马路仅辖岷州和铁州。^②可知，多思麻之地并不包括宗喀。然用安多一词，也不准确。安多，是指使用藏语安多方言的地方，清代才普遍使用。其大致范围包括除玉树以外的青海全部藏区、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河西藏区以及川西北的阿坝藏族自治州。^③宋代汉文文献中的吐蕃居地虽然主要在安多地区，但有一部分则在安多地域概念之外，如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三中提到的吐蕃居地“政、绵、威、茂、黎、移等州”。^④还有些部落居地实际上已进入玉树地区，如陇逋族。但比较而言，安多的地域概念比“脱思麻”涵盖更宽。故本书将清代的“安多”一词同宋代的“吐蕃”一词结合使用，以取代“安多藏族”这样过于现代化的概念。

我认为，安多藏族形成的标志即是河陇汉族及其他各族的“吐蕃化”的完成，而这一完成时间大约就是在五代之时。安多藏族形成初期，其民族构成是极为复杂的。在吐蕃占据河陇地区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由于其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对被统治民族实行强制性的“吐蕃化”政策，可以说，包括汉族在内的河陇地区大部分民族均被吐蕃同化。在唐末五代初还常见于河陇地区的许多民族到宋时全部不见了，概以吐蕃称之，这就是历史呈现给我们的史实。我搜集了不少关于安多藏族先辈的传说，如果这些传说

① (法)石泰安著，耿昇译：《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元史》卷60《地理志三》。

③ 黎宗华、李延恺：《安多藏族史略》第1章页2，青海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3《吐蕃在唐最盛》。

都可信的话,那今天安多藏区的大部分藏族都是来自于卫藏之地。显然有许多传说带有对藏族先辈的炫耀和附会。藏籍《白史》称:“安多之藏族,亦多系昔时军队驻扎该处所发展者。”^①《安多政教史》亦云:“多麦南北各地人民,好多都是吐蕃法王派来驻防唐蕃边界的部队之后裔。”^②当然不可否认,从卫藏进入河陇的吐蕃军人后裔是安多藏族的重要来源,但不是最主要部分。在安多藏族形成初期,安多藏族最主要的民族构成应是“吐蕃化”的汉人、吐谷浑及诸羌。当然,这无法精确到具体的量化,而是我的一种认识。

宋金时期的安多吐蕃,最重要的应是对“部落”的关注。从实质上讲,这一时期,“族帐分散,不相君长”的安多吐蕃并没有建立过强大的统一政权,而只是先后以“立文法”的形式建立过几个有一定号召力的部落联盟。因此,研究部落史就成了宋金时期安多吐蕃史的“核心”。记得 1981 年银川的西夏史会议上,西南民族学院的陈宗祥老先生听说我研究唃厮啰家族,就对我说:“一定要关注甘青川这条民族走廊上的民族部落。”不知为什么,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就是在我的主要学术精力已从西北转向南海时,我还经常想到了陈宗祥老先生和他的这句话。事实上 20 余年来我对“部落史”始终予以关注,对西北各族部落的研究亦是我西北民族史研究中用力最勤的部分,不管是党项还是吐蕃。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有两个没有打通:一是汉文资料和藏文资料无法打通,二是宋元安多与明清安多还没有打通。故所见之识,很难说是真知。

^① 转引自闵文义:《东迁蕃民与舟曲藏族》,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2 期。

^② 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第 3 章页 22。

对甘青川藏民族走廊上的部落研究，当然应推崇的是欧洲的藏学家们，如托玛斯、图齐、赫尔曼、霍夫曼、石泰安及拉露女士等，特别是石泰安，他以极为丰富的藏文资料解读了甘青川藏走廊上的古部落，他的几部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的经典之作，^①受到了世界藏学界及汉学界的推崇。但我仔细认真地拜读完石泰安的著作后，除了对他藏语文献学识的渊博表示钦佩外，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他的研究过程与结论大部分与汉语文献记录沾不上边。汉语文献记录藏族历史的确有不太准确的地方，但它记录的总是人与事；藏语文献记录的虽有许多比汉文准确的地方，但它记录的总是哲理与神话。因此，读石泰安的史著往往更容易使人坠入云里雾中。

其实，关于宋金时期安多吐蕃历史的藏文记载是微乎其微的，汉文资料也十分星散，不成系统。因此，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对这一时期的安多吐蕃历史是一无所知的。研究宋金时期安多吐蕃史是藏族历史研究中的一道难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几乎无人问津。而最早拉开宋金时期安多吐蕃部落史研究序幕者为日本的几位学者。中岛敏 1934 年发表的《宋朝与西夏、西羌部落之争》^②及榎一雄 1940 年发表的《王韶对熙河的征服》^③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宋金时期安多吐蕃史研究之嚆矢，特别是榎一雄的文章，更是

① 石泰安：《弥药与西夏：历史地理和远古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通报》第 44 卷第 1 期，1951 年；《西藏史诗和游吟诗人的研究》，法国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巴黎，1958 年；《汉藏边界地区的羌人》，载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宗教科学系《年鉴》，1957—1958 年；《川甘青藏走廊古部落》，法国高等中国研究所丛书第 15 卷，法国大学出版社 1961 年版。

② (日)中岛敏：《宋朝与西夏、西羌部落之争》，载日本《历史研究》第 1 卷第 6 册，1934 年。

③ (日)榎一雄：《王韶对熙河的征服》，载《蒙古学报》第 1 期，1940 年。

对居住在湟水流域青唐部落的地理问题给予了重点的关注。到1964年,日本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前田正名先生出版《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①其中四、五、六章完全是对8—11世纪安多吐蕃史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展开对六谷蕃部及青唐城的研究,其结果给人许多启迪。但如果从研究安多吐蕃史的专业性而言,日本的两位学者岩崎力与铃木隆一的贡献最为突出。下面我想引佐藤长先生的评论对两位学者进行介绍:

从那时起,岩崎力一直对青唐部落进行着研究。他出版的著作包括附有注释的《青唐录》的修订本。^②《青唐录》是一部业已失传的重要历史资料。他还研究了西凉统治的详细情节。^③他的研究成果把西凉政体统治的衰微归于西宁宗喀地区唃厮啰政体的出现。^④他探讨了导致唃厮啰政体建立的藏族各部落之间的斗争,唃厮啰政体的现实性及它与宋朝及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⑤他的研究成果认为,西夏的建立并非简单的出于李元昊偶然继承起伏德明之位的缘故,而他与湟水盆地藏族部落不断激烈斗争取得胜利是主要促成因素。^⑥

^① (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日)岩崎力:《宋代青唐部落史料》,载《中央大学大学院论丛》第5卷第1册,1973年。

^③ 岩崎力:《西凉府潘罗支政权始末考》,载《东方学》第47期,1974年。

^④ 岩崎力:《西凉府政权的衰落及宗哥族的发展》,载《铃木俊先生七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山川出版社1975年版。

^⑤ 岩崎力:《宗哥城唃厮啰政权的特点及结构》,载《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1978年第2期。

^⑥ 岩崎力:《西夏国的建立与宗哥族的动向》,载《中村治兵卫先生七十寿辰纪念东洋史论丛》,刀水书房1986年版。

这部著作研究了佛教及佛教僧人在河西藏族的部落政体的建立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① 他解释了西夏李元昊与各藏族部落的关系。这种关系限制了唃厮啰政体扩大其影响。^② 岩崎力还用英语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介绍了西夏、西凉府和唃厮啰政体之间的斗争。^③

铃木隆一是与岩崎力同期坚持研究青唐王国的另一名研究人员。他首次论述了和阗人阿里骨如何与嫁给第二王董毡的契丹公主共谋在他死后篡夺王位的。^④ 铃木隆一接着研究了青唐诸王唃厮啰之名。^⑤ 他认为，这个名字不是唃厮啰的本名，而相当于藏文中“王子（国王）”。他认为溪赊罗撒和结施搅这样的名字也是唃厮啰一名的拼法。铃木隆一进一步谈到第一任唃厮啰在其在位的后半期的功绩。^⑥ 他认为，在活动中，唃厮啰依靠其妻及“乔”部落其他成员的支持。他还研究了鬼章的活动情况，^⑦ 鬼章在董毡政体中掌管军事事务。^⑧

① 岩崎力：《宋代河西藏族部落与佛教》，载《东洋史研究》第46卷第1册，1987年。

② 岩崎力：《西夏王国的建立及党项部落》，载《中央大学亚洲史研究》第14册，1990年。

③ 岩崎力：《北宋时期和西藏族部落之研究》，载《东洋文库研究所研究报告》第44期，1986年。

④ （日）铃木隆一：《青唐阿里骨政权的建立与契丹公主》，载《史滴》1983年第4期。

⑤ 铃木隆一：《唃厮啰——青唐吐蕃王国之名》，载《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5期，1985年。

⑥ 铃木隆一：《青唐吐蕃唃厮啰王朝与青海藏族部落：以乔家族为研究重点》，载《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6期，1986年。

⑦ 铃木隆一：《青唐大酋青宣结鬼章与熙河》，载《安田学院研究纪要》第27期，1987年。

⑧ （日）佐藤长著，向红茄译：《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载《国外藏学译文集》第12辑，页251—293，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